

韦伯的新教伦理

由来、根据和背景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ORIGINS,
EVIDENCE,
CONTEXTS


哈特穆特·莱曼 编
京特·罗特
阎克文 译

Cambridge Collection
剑桥集粹

韦伯的新教伦理

由来、根据和背景

哈特穆特·莱曼 编
京特·罗特
阎克文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沈阳

版权合同登记：图字06-2000-8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韦伯的新教伦理/ (美) 莱曼(Lehmann, H.)等编; 阎克文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3

(剑桥集粹)

书名原文: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ISBN 7-5382-5969-4

I. 韦… II. ①莱…②阎… III. ①韦伯-人物研究-文集②新教-影响-资本主义-思想-研究-文集 IV. B5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5884号

Weber's Protestant Ethic

Copyright©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1993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200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作者	哈特穆特·莱曼 京特·罗特
发行	辽宁教育出版社	译者	阎克文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特约编辑	谢翰如
版次	2001年3月第1版	责任编辑	闵凯
印次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责任校对	马慧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1/32	封面设计	吴光前
印张	15	版式设计	赵怡轩
字数	246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30.00元		

内容简介

马克斯·韦伯赋予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种内在的联系，自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年间出版以来，他的这个著名的命题就一直是欧美学界热烈讨论的对象。近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韦伯传记作家和宗教社会学家从各自的角度对这同一文本进行了不懈的研究，欧洲学者和美国学者的诠释方式及得出的某些结论竟大相径庭，美国的韦伯研究者自1920年以来形成了与欧洲学者截然不同的传统。1990年5月大西洋两岸学者在华盛顿举行研讨会，会后形成这个文集。文集收入18位学者的文章，其中9位来自欧洲，9位来自美国；这18位中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又各占半数。这个文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迄今为止欧美学者对韦伯命题的研究成果，揭示了韦伯思想的神学、哲学、政治学和生平背景方面一些鲜为人知甚或不为人知之处，总结了当代对韦伯这一综合性理论的历史根据的认识，以及评估这一理论的生命力的方法论问题。

译者前言

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自17世纪以后便逐渐形成欧洲学界的一个边缘性论域。但是对此进行集中论述，则使它成为马克斯·韦伯的原创性命题，而且在韦伯庞大的社会学体系中有筚路蓝缕之功，进而在欧美学术界引发了长达近一个世纪、至今仍未平息的争论。国内学界对韦伯的关注正日渐深切，不过遗憾的是，关于韦伯这一命题的历史、神学渊源和思想背景，至今仍未见到比较系统的介绍，这对于准确解读韦伯恐怕是个很不利的因素。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1990年5月召集大西洋两岸韦伯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举行了一次研讨会，就这一命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在会后整理出版了这个文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由来、根据和背景所进行的研究与争论进展情况。蒙沈公昌文信托，兹将本书勉力译出，以期有助于国内学界参考。

特别感谢学兄冯克利先生一如既往的指点，不仅应我之求，着力剖解了多处艰涩疑难问题，而且拨冗译出了第六章，译笔之酣畅令我自愧弗如，想识者自有公鉴。书中部分拉丁文、古英语的翻译，幸赖福建师范大学林纪焘教授赐示，得使译笔较为圆满，谨一并致谢。

由于事涉大量宗教社会学、基督教神学以及拉丁和北欧语言的知识背景，译者虽用心斟酌，反复推敲，并尽力利用了国家

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现有的相关资料，但仍然不敢肯定若干处译笔是否恰当，日后将会始终令我惴惴于心，惟有敬待方家赐教。

阎克文 谨识

2000年7月

前 言

在德国和美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中，某些学术著作曾经——有的至今仍然——具有特殊的影响，值得那些关心在旧大陆和新大陆之间发生的观念转移的人们注意。雅各布·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就是这样一部具有横跨大西洋意义的著作；其他还有欧文·帕诺夫斯基的《圣像画法研究》和《早期的尼德兰绘画》，厄恩斯特·坎托罗维茨的《赞美皇室》和《国王的二体》，以及埃里克·埃里克松的《青年路德》。然而，没有任何著作能像马克斯·韦伯初版于1904~1905年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那样，至今仍是大西洋两岸热烈讨论的对象，至今仍然吸引并将继续吸引众多不同专业的众多学者的注意。

过去几十年间，人们在三个不同的方面对这部著作展开了研究。从事17世纪历史研究、特别是研究加尔文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历史的史学家，利用韦伯的命题以阐明禁欲主义的新教是否确实——以及如果是，又是如何——开启并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1920年出版的增订本，被认为是韦伯思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似乎表明他病愈之后重新恢复了学术能力且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疾病曾迫使他在世纪之交放弃了海德堡大学的教席。此外，对于韦伯的传记作者来说，他的论文足以作为他运用观念类型书写历史的理论标志。最后，宗教社会学家利用韦伯的命题论述禁欲主义新教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为构思普遍适用的发展规律而获取证据，使之能够用于加强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伦理，从而加强资本主义。

虽然这三方面的人士都利用同一个文本作为出发点，但在过去几十年间，他们诠释这一文本的方式以及他们得出的某些结论，却是各唱各的调、大相径庭。而且，与欧洲的韦伯研究者相比，美国的学者1920年以来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韦伯学术研究传统，因而他的论文在他们讨论其意义和重要性时发挥了截然不同的作用。考虑到这一点，似乎应当邀集那些最近几年特别专注于《新教伦理》的韦伯学者来展示一下互相冲突的诠释，探寻获致共同基础的可能性。由哥伦比亚大学的京特·罗特和我本人作为召集人，邀请了一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宗教史学家，1990年5月3~5日雅集华盛顿的德国历史研究所，非常热烈、认真和富有启发性地交流了看法，并且时有争论。学者们希望把他们的讨论心得融入自己的文章，于是就有了这个经过修订并附以必要注释的文集。

这次学术活动有几项成果值得强调指出。大多数发言者都认为，韦伯的洞察力和他所认为的《新教伦理》的影响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以及他所使用的术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那个时代的学术水平所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韦伯的命题显然已经过时，在他身后又经过了兩代人的时间，如今它只有相对的重要性。同时，许多与会者也指出，韦伯在某些方面清晰有力地表述了他的命题，刺激了对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最为引人注目之处的研究，并将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而且，在他身后，没有人就这方面的研究产生过能和他相匹敌的影响。尽管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解读韦伯的这一文本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这次会议却有助于表明这部著作经久不衰的重要意义。

向那些在各个阶段对这项尝试的进展给予支持的人们致以谢

忱，乃是最为令人愉快的义务。如果没有京特·罗特的帮助，没有他的专业指导，我们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弗里茨·泰森基金会毫不犹豫地向我们提供了慷慨的财政资助。尽管研究所在会议之前不久才迁入新址，但是全体同仁辛勤劳动，努力提供了一个既能专心工作又能适当消遣的舒适环境。向会议赐稿的人士迅速周到地准备了他们用于发表的文章。肯尼斯·莱福德博士付出了大量辛勤劳动帮助我们校订了本书。京特·罗特和我相信，本书体现了所有给予我们支持的人士所做出的贡献，我们对他们深为感激，并且相信本书是向他们表示谢忱的恰当标志。

哈特穆特·莱曼

1991年4月于华盛顿

绪 论

京特·罗特

(一)

1871年俾斯麦创建德意志帝国的时候，美国还不是世界强国，但这两个国家都是人口急剧增长而宗教上却是异质的蓬勃兴起的新教帝国。在帝国主义时代，三个新教帝国——第三个是大不列颠——必然会相互对抗，而法国与俄国虽然仍在进行着和平或军事形式的冲突，但是联盟的性质已经有了历史性的开端。1898年的美西战争——一个蒸蒸日上的新教国家击败了一个日薄西山的天主教国家——之后，德意志帝国不仅发起了一场针对大不列颠的海上军备竞赛，而且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的文化攻势，旨在遏制占据优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影响。一时间，德国向美国的移民逐渐停止，而德国教授的学术旅行却蔚然成风，交换教授职位的做法得到确立——许多幻想也得到了滋养。1904年在圣路易召开的世界大会就是这种努力的顶点，马克斯·韦伯与玛丽安妮·韦伯、厄恩斯特·特勒尔奇以及其他许多德国学术界人士都参加了大会。汉斯·罗尔曼在本书中讲述了这次经历的部分内容⁽¹⁾。当时的人们恐怕难以置信，一

(1) 另见我的“Deutsche Ambivalenzen gegenüber den Vereinigten Staaten”，ch. 6 of *Politische Herrschaft und Persönliche Freiheit* (Frankfurt: Suhrkamp, 1987), esp. 175 - 200。那里谈到了马克斯·韦伯对美国的强烈兴趣，他曾计划和朋友保罗·格尔一同参加1893年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但是他急于和玛丽安妮·施尼特

个像华盛顿德国历史研究所那样的机构，直到1987年才得以建立。随着两次世界大战中的对抗使得两国间的关系历经政治沧桑，这种思想互动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团乱麻。由于大多数德国学者在 *Kultur contra Zivilisation*（“以文化对文明”）的旗帜下投入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损害了德国文化的国际声望。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彻底摧毁了马克斯·韦伯那一代人为了德国的全球文化使命而提出的主张。

看上去矛盾的是，正是由于纳粹在20世纪30~40年代把许许多多的学者、科学家和作家驱赶到美国，这才保留下来一点德国的影响。韦伯在美国、其次在英国被接受，就是这一矛盾现象的证明。然而，韦伯思想中和几代读者中的许多不同关切与动机，使得这部著作有了国际范围的重大意义。这真是令人感到意外。一位坚定的德国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他的祖国能够崛起为世界强国，他的著作何以能在他去世那么长时间之后如此风靡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当然，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论，答案涉及二战之后美国与国际事务的纠葛，以及美国社会科学同样起劲地转向这样那样的现代性理论形态。但是为什么初版于1904~1905年、其命题在1920年又予重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那些年间所仅有的德国人的历史研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至今仍在英语世界散发着活力并引起争论？（自那时以来，如今只有寥寥无几的美国专业人士在解读德国历史学家。）显然，韦伯对20世纪社会科学的广泛影响，有助于这一命题的历久常新。而且，从一开始，这项研究就被认为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与物质因素相对立的理想的重要性——如

格爾订婚又阻碍了这个计划。刺激了他对美国的浓厚兴趣的看来是他的一位世交、自由主义者弗雷德里希·卡普(1824~1884)，帝国国会议员，1849~1870年在美国生活，曾是纽约政界的显要人物。

果不是自主性的话——的有力论据。在几十年的冷战期间，它无疑给美国提供了这种效用。但它在美国长期享有盛名还有其他一些原因。

一个重要的意识形态原因与韦伯对英国和美国的看法有关。在他那个时代过于亢奋的民族主义气氛中，韦伯却是最新一批自由主义亲英派人士之一。他欣赏清教和教派遗产、民主制度以及英美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快就在英美人士中找到了知音，因为他认为新教、政治自由和世界强国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韦伯非常赞同英国自由党保守派历史学家为“清教革命”及其自由主义之果塑造的崇高的自我形象。他为了突出对德意志帝国的文化与政治批判而着意夸大了加尔文主义和清教的世界历史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年轻的美国公理会教友、交换来德的留学生塔尔科特·帕森斯，在海德堡偶然读到了《新教伦理》。书中所论清教和资本主义的联系使他大为倾倒，于是他译出了这部著作⁽²⁾。留学期间，帕森斯所阅读的韦伯思想成了他关于规范化制度整合的结构-功能分析学说的主要成分。由于他已经开始把职业视为官僚资本主义得以运行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韦伯所阐明的目标——分析“新教禁欲主义这一现代职业文明(*Berufskultur*，一种现代经济的‘唯灵论’成因)的功能”——便非常适合他业已成熟的范式。假如韦伯没有写出《新教伦理》，青年帕森斯就不可能那么热切地关注他后来的著作，同样，假如美国的社会学、尤其是帕森斯学说没有那样的声望，韦伯也不可能在德国重放光彩。(青年沃尔夫冈·蒙森著名的1959年博士论文《马克斯·韦伯与1890~1920年的

(2) 见 Talcott Parsons, "The Circumstances of My Encounter with Max Weber", in Robert Merton and M. W. Riley, eds.,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Norwood, N. J.: Ablex, 1980), 39. 《新教伦理》的引文均出自帕森斯的译本(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58)。

德国政治》本有可能埋葬韦伯而不是使他复活。)实际上,原初的辉格党释义,是在韦伯为了进行争论而加以改动之后,由帕森斯和其他人重新引进了英美世界,并进一步增强了美国人对于新教和自由主义民主之间内在联系的正统认识⁽³⁾。在我看来,输出和重新引进新教的孤芳自赏——且不论是否洋洋自得——是说明美国人之所以接受韦伯命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这一命题对于德国人来说创造了—种反面的神话——德意志帝国的“先天不足”,但它却给美国的神话添了光彩。用威廉·麦克尼尔的术语来说,它是一个有力的“神话—历史”实例⁽⁴⁾。因此,韦伯的理论连接了他那一代人的另外两个十足的神话: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⁵⁾1893年提出的边疆命题和查尔斯·比尔德⁽⁶⁾1913年对宪法的经济解释。按照定义来看,神话—历史乃是多产的论战性意识形态激情和政治战。激励人们出于信奉和批判立场而进行研究的始终是棘手的而不仅是挑战性的历史命题。

重温重要学者和著作以对我们的认识做出评估并寻找新的视角,这是合乎常规的。有时候,尽管做出了很大努力,一部渐被遗忘的著作仍会渐渐隐入忘乡——例如,由于出现了完满的或批判性的著作;有时候,它会由于是写给另一代人的而得以重放异彩。在这两种情况下,“重温”都会表明在时间和视角上

(3) 只是到了最近,这种正统认识才在美国社会学内部受到了批评审视,见David Zaret, "Religion and Rise of Liberal Democratic Ideology in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

(4) 见 William H. McNeill, *Mythistor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5)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1861 - 1932), 美国著名学者, 1893年提出了环境对移民的影响的新理论, 后以“边疆学派”闻名。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译者

(6) Charles Austin Beard (1874 - 1948), 美国历史学家, 因从经济角度阐述美国历史而享有盛名, 被认为是20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之一。——译者

的某种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说，韦伯的命题无须重温，因为它拒绝被遗忘，尽管许多人经常怒不可遏地想要彻底结束它的生命。在少数学者看来，它已经变成了适得其反的东西，它的历久不衰显得令人厌恶。确实，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命题而不是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学理论，在今天看来它已经相当陈旧了，因为韦伯所设想的一部学术著作的生命力最多能够持续半个世纪。然而，时间的推移必然使得我们越来越不可能直接把握这部著作。事实证明，我们所关心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正是由于这些问题才出现了韦伯的定见——已经发生了更为广泛的背景变化。事实上，关于对17世纪的最新解释能否被接受的问题，也有同样的情况。

过去10年间，人们对韦伯思想的背景和来源的兴趣有增无已。在德国，这种趋势与重新审视德国的过去、尤其是重新审视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作用有关，虽然关于德国的“特殊道路”（*Sonderweg*）与“史学家论战”（*Historikerstreit*）的争论因为德国的统一这一不争的事实而黯然失色，但是这种争论必然会改变历史言说的标准。在美国和英国，“观念的背景”（这也是剑桥大学出版社以此为名的丛书）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尤其是社会理论，一直在为历史解读的相对价值进行热烈辩护，反对以现代主义方法利用经典作家。

因此，多年来有些德国作者一直在研究韦伯著作的哲学渊源。在某种程度上这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科学及其现代主义和行动主义关切的衰落有关，也与保守主义时期作为论题和一门专业的对历史的还原有关。此外，有些德国政治学家和文人学者还热衷于把韦伯从美国带回故乡，特别是千方百计使他远离美国社会科学、使他摆脱美国化的德国形象。主要是在法国和美国，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势力一直在抨击西方的

107250

“元叙事”，而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尤其是新教世俗禁欲主义的理论。本书的编辑宗旨并不拘泥于这两种倾向——韦伯的“回归”和“后现代化”——之一，尽管赐稿者个人可能会认为自己更接近于这种或那种倾向。本书内容限于思想史和文化史范围。所有作者都在这一广阔的领域之内进行讨论，尽管表面上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平分秋色，但却有着条理井然的联系。来自美国与欧洲的赐稿者各占半数，其中有几位移民学者。本书的第一个意图是讨论韦伯命题的由来与背景，为此而选用的多是德国人的论述；第二个意图是讨论韦伯命题何以在某些时期适逢其会、历久不衰，在另一些时期却毫无价值，为此而选用的多是美国人的论述。

(二)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涉及到韦伯生平三个方面。首先，韦伯是在天主教和新教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激烈冲突时成年的，那时对于路德主义和改良主义（加尔文主义）的强行统一仍然保留着某些不幸的记忆。其次，在成长时期，韦伯见证了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得到遏制，以及威权主义在国家和工业中取得的成就。第三，他是由于并最终参与 *Methodenstreit*（“方法论论战”）而成熟的，那是一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实证主义和解释学、理论和历史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一场被纵横交错的争论路线复杂化了的斗争。

着重探究韦伯命题的由来和背景的论文，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头四位作者分别论述了同一个基本主题：宗教冲突不仅对于韦伯、总的来说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意义。除了天主教会、新教君主制和自由主义资产阶级之间

的冲突之外，*Kulturkampf*（“文化斗争”）也影响着近代社会和近代学术的全部意义。格拉夫指出，韦伯乃是神学造诣最为渊深的经济史学家。他论证了韦伯思想的主要神学来源——马蒂亚斯·施奈肯伯格——对路德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生硬合并的重要性，并且详细考察了新教教会和国家统一前后发生的神学争论的政治背景。由于厄恩斯特·特勒尔奇的影响——格拉夫认为这种影响要比韦伯本人和其他许多人所承认的大得多——韦伯与当时最重要的路德教神学家阿尔布莱希特·里敕尔成了对头。里敕尔和韦伯双方都在同国教中的正统保守势力进行斗争，不过前者在过时的天主教与各种形式的禁欲主义新教之间看到了一种历史连续性，而在后者看来，路德教更接近于天主教。对于里敕尔来说，一种国家自由主义的新教文化（*Kulturprotestantismus*）是帝国真正的意识形态支柱；对于韦伯来说，没有禁欲主义传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缺陷，因为路德教已经产生了一种权威依附的心态。由于把当时的神学背景视为重要参照点，格拉夫得出结论认为，韦伯的分析所具有的历史效力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问题。

然而，韦伯的研究背后不仅有着新教内部的争论，还有一部天主教和新教双方互抱成见与偏见的漫长历史。明希运用通俗宗教文献乃至运用旅行见闻，对韦伯的命题进行了一番追根溯源的研究。他同意格拉夫的看法，认为这些教派对于经济伦理的传统主义理解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并无重大差异，而韦伯对这一点的认识并不充分。当然，教会地产的世俗化和关闭修道院有着巨大影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废除圣徒崇拜和圣徒节使得新教似乎成了更便宜的宗教，而天主教却少有经济价值。然而，早期近代国家对宗教少数——包括天主教少数——的宽容有其商业化的考虑，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认为启蒙运动贬低

了宗教差异那种公认的文化价值。19世纪的最初30多年可以被看作相对的宗教和解时期，天主教和犹太教显贵不时分享宗教改革的盛宴。拿破仑时期教会地盘的土崩瓦解，使得数十年间德国天主教文化的制度支持遭到了极大削弱。19世纪30年代以后，一个新的冲突时期开始了，旧时的好战语言又卷土重来。志在必得的新教民族主义支配着德国，天主教徒越来越被视为异己因素而遭到排斥和贬抑，在韦伯写出《新教伦理》之前的10年间，反天主教的鼓噪达到了顶点。因此，在明希眼中，韦伯看上去最多也就是一位站在矮子肩上的巨人，这矮子就是反天主教成见与偏见的制造者们。

随着这场“文化斗争”在19世纪90年代的正式平息，天主教徒提出了得到平等待遇的强烈要求，尤其是在文官职位方面，但是自由主义者及犹太人认为，他们的要求往往并不足以被看作是对任命权的普世论关注，而是出于一种特殊恩宠论的考虑。尼普尔戴指出，“道德统计学”在这里获得了重要地位，不仅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而且还是一种新的政治论说方法。由于结果证明天主教徒在自由职业和大学中也得不到充分代表，即使像乔治·冯·赫特林那样的天主教代言人——他在1917年成为首相——也在帮助宣扬天主教徒受教育不足的观念。然而，一般来说，统计学研究者很少注意把宗教信仰作为说明教派差异的一个因素。因此，民族主义的兴起改变了以往的争论所使用的词语，并且使得——举例来说——法国历史学家低估了宗教改革在近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世俗环境中，宗教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非理性的现象，然而，韦伯所强调的是它的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尼普尔戴得出结论认为，韦伯的研究应被看作是对德国经济与社会史的贡献，同时也是关于现代性的性质的总体讨论的组成部分。